

4

1995.8-15

中国学界十年走势:从“主义”到“问题”

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沉思

走向世界的汤沐黎汤沐海兄弟
和他们的母亲

好莱坞著名男星和他们的妻子

反暴利应先向房老虎开刀

暗访南中国海海盗

伪气功揭秘

话说王蒙

讀者
讀

學林出版社

1995

目 录

观察与思考

4 从“主义”到“问题”

——中国学术思想近10年走势

11 警惕中国经济的盲点与误区

天下事

14 亚洲的崛起与欧洲人的心态

17 1995年世界一触即发的热点问题

20 美国何以坐视美元贬值

——外汇风波背后的日美贸易摩擦

二战风云录

22 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沉思

26 战争的第三只手

33 日本向中国投降纪实

人物

35 青春与我们长相伴

42 爱河中的戴安娜

46 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

48 斯大林与音乐家

社会广角

49 富人层引起的话题

52 反暴利应先向房老虎开刀

54 轿车的怪圈

55 伪气功揭秘

62 暗访南中国海海盗

随感录

65 只因都想跳“农门”

66 难以清廉

67 人格的亮色

69 美国人的“炒”技

70 读书感悟

71 朋友

72 日常琐思

婚恋与家庭

73 钱其琛：还是老窝好

74 婚姻铺

76 好莱坞著名男星和他们的妻子

78 奥黛丽·赫本鲜为人知的家庭生活

改革与国情

80 朱镕基论失策

80 诺斯论中国改革

81 新一轮改革不给任何优惠政策

81 国有资产流失有八个渠道

81 中国无意在内地建立经济特区

82 企业破产暂缓推行

82 国产汽车产业基地初具规模

- 83 我国税将有四大改革
83 中国失业保险改革方案初步确定
84 我职工福利负担结构将改变
84 国家将出台职称改革方案
85 '96 末全国职工都成合同工
85 沪公房租金年递增五成
85 1994 年我国减少耕地 600 万亩
86 我国粮食种植面积跌破警戒线
83 惜哉！我国用“惠”不足五成

经济生活

- 87 保险：家庭消费新热点
92. 消费者贷款：个人理财新渠道
93 投资理财活收藏

科技动态

- 95 前景诱人话光脑
97 全球崛起六大高技术群体

文化广场

- 98 话说王蒙
——谈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纯洁性
103 中国歌星的经纪人
110 出版界八大热点
111 陈凯歌谈《风月》和王安

忆

- 114 文化快餐化的隐忧
115 “北影”、“上话”实行“新政”和演员“自由职业化”趋势
116 中国古代十大音乐家

中外书摘

- 117 《教子》

港澳台之窗

- 123 香港财阀，权力大交接

国外见闻

- 126 莫斯科人艺术情浓
128 富国瑞士节俭成风
130 纽约的中国画家
132 芭提雅夜访人妖
136 美国发起“不看电视周”活动
137 宗教恐怖主义者的疯狂
140 法国大力倡导骑自行车

体育天地

- 141 中国乒乓让球史
144 天使与魔鬼之争

——当代体坛兴备剂探秘

百科知识

- 148 即将开征的遗产税有何规定？
148 保值贴补率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149 电脑操作系统常识

-
- 151 听古典音乐会的规矩
152 有利健康的“坏毛病”
153 你会呼吸吗?
153 DHA 功效不宜夸大
154 饮食中的“错配钙磷”
155 我国旅游城市的特色纪念品
-

九州方圆

- 156 我国将建10余座跨海通道
156 我国 20 余座城市拟建地铁
157 山西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电
基地
157 东北粮仓成为全国最大“米
袋子”
157 新疆正成为重要的石化基地
-

新论点

- 158 邓小平率先提出的10个观点
158 转换机制远胜转移产权
158 上海决策层提出经济新观点
-

- 159 不要轻易提“农村人口大转
移”口号
159 存量不活是最大的流失
160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
民
-

补白

- 13 天下奇景·洞中洞
32 国界轶事
77 翘翘板(漫画)
79 天下奇景·国中国
91 中国烟害的严酷现实
102 广州成为接收大学生最多的
城市
122 中科院院士知多少
128 世界十大贸易城市
147 天下奇景·岛中岛
147 天下奇景·海中海
-

从“主义”到“问题”

——中国学术思想近 10 年走势

徐友渔

“话说天下大势”总有几分冒险，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学界中“沉默的大多数”在书斋中默默耕耘，并不追风逐浪，但 10 来年间学术文化的研究与讨论确有若干热点和中心话题，而且其变化转换的轨迹亦隐然可见。对这种发展演进的知识社会学因素加以梳理，探究其内在理路，想来是有意義的。听说上海和广州也有学人准备在“现代与传统”上提起类似话题，可见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启蒙与新知

国内和海外在介绍、总结 80 年代中期学术文化活动时，往往依当时最有影响的“山头”（正规叫法似应为学术共同体）分出国学、科学、人文三派。我认为此说不甚全面，而宁愿按学术范围和兴趣将当时的活动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国学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学术 30 年来在大陆备受摧残，尤其是在“文革”后期，为了政治需要，竟将孔夫子和林彪捆在一起批。拨乱反正之后，国学趋势反弹。虽然

总体活动尚属恢复元气阶段，但若干海外传来的观点也着实振奋人心。海外儒者学业未辍，视野开阔，其中涌出几位大师，他们或治中西学于一炉，企图将融会贯通之理用于救治西方社会精神文化危机，或者论证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实得力于儒家学说道德。一时间，国学在大陆亦有遍卷神州风起云涌之势。

二、马克思主义向人性复归。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多年来宣传和坚持的意识形态，许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左倾教条主义，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简单化和歪曲之后的版本。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归宿是人的自由创造和全面发展。他们的话语最易与原先的话语系统衔接，故引起上下各方广泛注意。但由于涉及意识形态敏感话题，经历的风波也最多。

三、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宏扬，时值“科学的春天”，万千学子正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知，一批原先攻自然科学的学者引入并利用对国人尚属新鲜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

创建新说，以解说宇宙、社会、历史之谜。由于中国文化先天缺乏科学例证而孱弱难立，由于人们长期习惯于期盼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因此学术思想中对科学新知的倡导似乎代表了时代精神，传播神速，一时蔚为大观。

四、社会科学新思潮和观点的引介。一批学者大量翻译引进西方20世纪社会科学的著作和成果，重点放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法学方面。由于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译而不著，有时容易为人忽视，但这方面的努力在今日已结出硕果，分外引人注目，故对当初苦心经营的奠基工作应予充分关注。

五、人文精神的阐释。一些学者将自己的兴趣和方向定位于人文精神方面，以有别于那些经世致用的学问，这主要指哲学、宗教和文学。他们致力于译介以哲学为主的当代西方名著。同时研究中外现代文史哲各种问题，这方面的工作为国人深刻理解当代精神状况和学术潮流提供引导和路径，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

以上五个方面大致对应学术界的五路人马（基本上以丛书编委会的形式自立），当时也有交错重合，比如后三个方面工作，不但若干个编委会同时在做，全国若干个出版社也在做，至于哪些人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那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由这批人的学术专长决定。

一般情况是，某个团体的一两个带头人审时度势，以发挥自己的所长为主要考虑因素，聚集一批志同道合，专业爱好相同的人，在选定的领域里开拓发挥。

这是一个热气灼人的时代，以笔报国的热情激励着莘莘学子，他们愿以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给古老的民族注入活力，他们想遍采世界文化之精华以改变国民性。文化精英如雨后春笋般冒头，青年才俊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般涌现。

这是在外部信息爆炸，国内百废待兴的时代。万千读者像嗷嗷待哺的婴儿，学术上则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刚毕业的研究生，甚至尚未毕业的研究生，眼疾手快地纷纷跑马占地，那时谈不上学术功力、知识积累，只要脑子灵活外语好，一搞一个准。

好一派百花竞放，百鸟争鸣的景象！

耐人寻味的是，此时的中心话题并不新颖。和半个多世纪之前一样，仍是中西之辩，传统和现代之争。其实这并不奇怪，世界已飞速发展了六七十年，但历史竟像开玩笑似的使中国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仍然面对原来的问题：要不要学习西方，要不要走向世界？如果要，又如何学，如何走？

研究和讨论的水平没有超出上一次。原因很简单，17年的营养不良外加10年焚书坑儒式的革命，再聪颖的头脑也没有多少养份，贯通

中西的学者几乎没有，争鸣的环境远比不上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争论的焦点还是中西的体用问题，只不过按文字的最大组合方式多了几种形式上不同的答案。

这是一个大谈“主义”的时代，比如人道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有时谈主义不甚方便，就换一种说法，比如某某思潮，某某哲学，某某文明。

不能以轻慢和嘲讽的态度对待当时的种种主张和信念，按美国一套哲学丛书的编排，西方思想在信仰的时代之后，分别是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思想体系的时代，最后到20世纪为分析的时代。我们看到，除了最后一个特性外，80年代中我们的学术思想已经同时具备了冒险、理性、启蒙和体系化的特征，我们的步子可能迈得不踏实，但速度倒确实还可以，最近常听说一个词，叫做“后发优势”，用到此处颇为合适。

批判与反思

文化热兴起之后不久，一些新想法在学术沙龙中产生，有人感到这些想法可能开启学术研究的新思路，并有助于思考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后来发现，国内外已有人认真研究过类似问题。但当时交流中大家都很高兴。这些想法的要点有如下述。

在研究了西方的哲学史、政治思想史和历史之后，人们发现，所谓

西学，其实可以分为差异极大的英美和欧陆两支。英美文化重经验，爱怀疑，推崇多元，喜欢零敲碎打、点滴改进；而欧陆文化重理性，好绝对，独尊一元，追求总体和根本解决。欧陆之中，德法两国又有差别和侧重。德国文化好思辨，重整体和终极目的，法国文化具有浪漫和乌托邦色彩，批判性和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人们认为，欧陆的整体主义和浪漫主义比英美的多元论和怀疑倾向更容易成为政治的权威主义的思想武器。

人们还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和德国哲学的思辨性与整体主义属于同构；中国人的性格中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与法国人颇为相似；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德法因素压倒了英美因素，再加上俄罗斯文学（它散发出追求绝对、彻底而不妥协，爱作自我否定，以及病态地欣赏受难的宗教气息）的强大影响，使得个人自由和以妥协为基础的民主思想很难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土地。

人们联系到从本世纪初以来各历史阶段的现实，考虑学术思想在吸纳西方养份方面长期吃偏饭的情况是否有改变的必要。这种思路和历来的意识形态熏陶方向正好相反。

上述种种思考的明晰程度因人而异，且很少见于著述，但多所酝酿议论，确为事实。本人当时忝为“圈内人”，对内情略知一二。不谈这段思考历程，从80年代中期发展

到今天的思想路数就不易理清。

历史终于演进到 1989 年,这是五四运动 70 周年、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纪念日所在之年。在这一年里和这一年的前后,陆续有一些学者借批判性地反思这两大历史事件,把以前思考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了。争论当然是有的,但在中国大陆,人们终于听到了一种不同已往的说法。我至今并不认为新的说法就一定好,但它无疑深刻地影响了日后的学术和思想。

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无疑是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就思想文化而言,它们都具有彻底的反封建,毫不妥协地与传统决裂这一突出特征,正是这一历来备受赞扬的方面,现在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和批判。有人指出,文化是一个长期积累、逐渐演进的过程,对文化不能革命。还有人指出,文化中蕴含了一个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观念,文化的变革只能是去芜存菁,使其创造性转化,彻底否定传统只能造成文化失序,精神空虚,价值丧失。事实上,传统不可能消灭,也不能斩断。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有人打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号。与以前的褒贬相反,现在激进主义被视为轻率和不负责任的东西。

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启蒙作用也受到批判。有人认为,支持启蒙心态的是理性主义,即认为人借助于思维的理性力量和科学的方法,可以洞悉宇宙和历史,达到绝

对的真理。职是之故,有的知识分子以全知全能理性的名义,要求历史向一个既定目标前进,为了达到彻底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强行要求改变人的思想和灵魂。

有人不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而是监狱人满为患、断头机超负荷运行的恐怖岁月,激进的领袖被更激进的领袖宣判死刑,而他们都以全民意志或历史必然性的名义实行独裁统治。

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和民主被有些人讥为空洞的口号。他们说,民主实际上被理解成了没有中介环节的全民直接参政,这将导致暴民政治,或统治者以人民的名义施行不受制约的专政。而科学成了神化某种意识形态和垄断真理,压制不同意见的口实。

有人仅限于指出五四运动的阙失面,而另有些人则把五四运动否定到这个地步,似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幸皆发端于此。

格局的变化

90 年代学术文化的场景冷落萧条,和 80 年代中期的火爆场面恰成鲜明对照。“商业潮”猛烈冲击学术的根基,有人敲响了“精神失落”的警钟。中国知识分子固然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打击,但这一次的挑战更带根本性,因为他们不是因外部条件失去从事研究的权利,而是需要重新考虑自己工作的价值。被剥夺发言权有时反而使人生出勇气,无

人理采的悲哀却令人进退失据。

相对而言，国学研究还算有几分底气。这一方面是因为与海外交流的渠道日渐增多，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出现了一些空白需要它去填补。

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先的内部学理之争早已冷寂，因为“不争论”的指示博得多数人的欢迎。恐怕小风小浪在所难免，但决不会重现当年惊心动魄之景。争论的双方似都感到失落和惆怅：一方失去卫道的威严和实利，另一方失去悲壮和殉道的机会。

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失去昔日显赫声势，只在学院的讲台和专业刊物上占一席之地。原因我以为有三，均耐人寻味。其一，人们对大构架失去兴趣；其二，中国的文化品味追求善和美，远胜于求真，只是此种品味易涉“污染”而一度被抑制。其三，国人多喜异求新，不论“老三论”还是“新三论”都只能引起一时的兴趣，眼下更多的人则一竿子直入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以社会学、经济学为首的社会科学逐渐成为当代显学，其强劲的势头已不限于学术领域，而且大大活跃于新闻传媒，并成为各级决策层必请的座上宾。若干宗教、哲学、文学研究者开始转向社会学或兼治社会学，一些最重要的学术群体俨然成了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核心的共同体。实用学科发展扩张的架式

咄咄逼人，已使某些人文学者产生窘迫之感。以前被笼统之地称为“社会科学”的各门专业，现在显出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明显分野。弄清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想必有一定意义，以下是几点粗浅分析。

第一，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建设是当务之急，而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急待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不见得是“本质”性的，似乎可以与“主义”无关。

第二，社会学以前几十年被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几乎成为不毛之地。平反之后，开发者可占捷足先登之利，转行者也不一定处于后发的劣势。

第三，和以前相比，知识分子的心态有所逆转。五四运动后期有“问题”和“主义”之争，大陆知识分子以前接受了一边倒的结论，现在感到胡适之言亦不无道理。此外，在“皮”和“毛”的问题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讲问题比谈主义合乎时宜。

第四，与上一种心态变化有关，有人认识到知识分子的职责除了从事社会批判（与政治上的反对派是两回事）之外，更应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由此造成启蒙和批判势弱，而就事论事的实证研究盛行。

最后，人文精神的阐释虽感内外受逼，但学术水平仍有长足进展。海外有人学成归来发出感慨：今日学术水准远非10年前可比，以前那种泛泛之谈根本上不了台面，许多领域都有人就一个个具体问题作认

真研究。

从10年前高谈主义到现在悉心研究问题，除了表明学术研究取得扎扎实实的进步，亦反映了对激进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成效。许多人放弃了彻底决裂，根本转变、总体革命、大破大立的抱负，转而欣赏新旧传承、点滴积累，迂回缓进。应该提醒的一点是，弃绝主义而拥抱问题也有出于无奈的因素，不承认这一点恐怕是自欺欺人。

几点评论

面对学术界的新局面、新气象，人们不免要抚今追昔，比较评论。

有人说，80年代中期“文化热”时是有思想无学术，现在则是有学术无思想。我以为此论既不确定，也失公允。80年代学术文化活动的可评议处甚多，我只想指出两点不足。

一是有一种泛文化倾向。如前所说，当时中心话题是中西之争，如果说本世纪初关于学西方经历了器物、典章、文化三个阶段，那么这一次讨论则是干脆跳过物质文明，直接涉入体制，紧接着便落实到文化层面。当时有一剂药治百病的倾向，似乎只要解决了文化问题，其余问题均不在话下。其实，将万般弊病均归诸文化并未把准脉。有人当初大谈文化是出于语境原因，但因为越讲越顺，竟忘了初衷，假戏真作，飘飘然在文化的云端神游而回不到现实的大地。

二是在80年代的学术论争中，或多或少有被海外华裔学者牵着鼻子走的情况：问题是人家提出的，基本概念，重要的论点也是人家的。虽然从他们那里受到不少启发，但他们的许多见解也并不见得就切中肯綮。直到现在，我们才学会自己提出问题并以独立的方式解决问题。

说到这里，应该指出，近几年北京一批学者反复强调建立学术规范，此事具有莫大的意义。为什么海外一些知名学者会一直认为大陆学界思想胜于学问，为什么我们会认为80年代的学坛有浮躁的毛病，为什么至今我们还会见到一些天马行空、自说自听式的为学方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严格的学术规范没有建立。也可以说，中国历来有自己严谨的学风，但曾经发生过失范，至今没有很好恢复，现在需要重建，并与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接轨。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之处甚多，这里不能细说，仅引陈平原先生一段中肯之语：“如果说80年代是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跑野马’或者‘学风空疏’都可以谅解，那么，90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有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前此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

我以为，人文科学的价值和地位问题，亦是当前学术思想界最为关切，也是最复杂、混乱的问题，应该加以澄清和讨论。

许多学者最近谈到人文精神的失落，在我看来，其所论主要内容属于精神文化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外力对于人文精神的挤压，一是商品经济潮流引起民间人心浮动，百姓厌书，学生弃学，颇有“文革”中“读书无用论”返潮之势；二是政策上偏重实用科技，虽然也讲狠抓精神文明，讲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但实际上只重物质建设，甚至未将社会科学研究者（更不用说人文学者）视为科学家。

我在这里还想讲讲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属于精神文化的内部关系问题，即人文科学是否受到来自实证学科的压抑或威胁。

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批判与敌视来自两个方面。从哲学上说，当代西方思想大师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认为在当代科学和理性盛行之时，人类却陷入了一场精神和人性的危机。因为当代主流意识把认识论当成了哲学的范本，把精确性、可预测性当成科学的唯一准绳，认为人类的一切认识都可以靠科学方法来完成，科学既可提供世界观，也可提供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意义上捍卫人文学科的独立性和尊严，我以为是对的。当然我们不能夸大人文和科学的矛盾，因为中国和西方不同，我们的传统哲学中从来没有把认识论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当代中国文化中丝毫不存在科学霸权主义。

另一种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敌视和拒斥与对五四运动的批判性反思有关。有人把五四提倡的科学等同于唯科学主义，并借哈耶克对笛卡尔和卢梭的理性主义传统以及强制性的积极自由观的批判否定五四的启蒙精神，为传统儒家文化争地位。他们的主要论据是，曾在中国猖獗一时的左倾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曾以科学性自相标榜，以洞悉历史的必然发展为借口对人和进行摧残性改造，而种种倒行逆施都以继承五四精神自居。

我认为这种论证没有道理。提倡科学精神，在五四时期所起的社会作用主要是反对封建愚昧，在今日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反对长官意志。另外，科学和理性曾经成了扼杀人性的借口，并不是它们本身的过错，况且直接理由是阶级斗争，与科学、理性又有多大关系？其实，任何积极的东西都可能成为行恶的口实，罗兰夫人不是早就说过：“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在本文所论的10年内，中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比，中国学术界内种种起伏曲折无非杯水风波而已。学术思想的作用不宜夸大，但它毕竟不是个人游戏。当时主义之争论和今日问题之探索，内中实有一脉相承的东西。“主义”和“问题”后面又是什么，且待10年后再作分解。

（摘自《东方》1995.2.）

警惕中国经济的盲点与误区

仲大军

“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中国是个谜。”在从上海返回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上，卧铺对面的荷兰人罗恩·南斯克迷惑不解地对我说。

不可思议，仅仅才几天，许多摩天大楼冒出来了，许多高速公路和新工厂出现了。关键是人们的头脑，昨天还在那样想，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今天就琢磨着如何引进外资，搞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中国人的思想变化太快了！思想意识转变得快，物质面貌变化得也快。由此，开始出现了奇迹，由此，中国人的头脑更加过热，步伐迈得更大，欲望更加强烈。搞得外国人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我们自己也飘飘然了。

于是，借着外资汹涌，199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一下子跃上1.6万亿元，比1993年的9000亿元还多出一大半。中国人的建设欲望太大了，看看1994年国家计委下达的150多个重点建设项目吧，煤炭项目23个，电力39个，铁道17个，交通15个，钢铁10个，化工8个，石油6个，有色金属6个，邮电4个，石化2个，汽车2个，建材3个……这还不包括大批的地方项目。就这

么个建设法，经济增长速度能慢得了吗？这不，尽管一再控制，降温，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还是增长了将近12%。

一个时间以来，全国上下，投资潮几乎席卷每一个角落。且不说沿海地区县县搞开发区，镇镇搞开发区，甚至内地也开始村村搞乡镇企业。不顾一切，大上工业项目，几乎达到了全国资源总动员的程度。

可以说在大多数的领导干部以及企业家头脑中，加快发展就是好事情。数量和产值就是一切。为了指标，某些部门甚至不择手段，胡吹海口，欺上瞒下，造成中国的统计数字中掺了大量水分。

仔细琢磨琢磨，大规模的投资，必须倾注大规模的资金。倾囊而出，必然造成国库掏空，银行储备枯竭。由此必然导致大量发行钞票，而大量发行钞票的后果必然就是恶性的通货膨胀。

终于，中国出现了难忘的1994年。法国大作家雨果曾以《93年》而闻名，中国是否也要来个轰轰烈烈的《94年》或《95年》？

这个道理也好明白，通货膨胀就是让老百姓多拿出些钱来投入到建设中去，其实从发展角度看，也

未必不是好事。要不，这钱让人们拿去吃了喝了用了，也怪可惜的。新盖裤腰带多上它几座发电厂或钢铁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本来是应该的。

但万事应有个限度，有个量力而行的原则，还更要讲求经济效益。否则，步子迈得太大，身体容易歪斜。墨西哥最近发生的财政危机就是最好的一例。大量的进口（光从美国一年就进口400多亿美元），使其外汇储蓄在两个月内从170亿美元下降到60亿美元，本国货币比索的汇率急剧下降，币值贬值50%。这种教训足以引起高速发展的国家注意。

一段时间以来，快发展、快入关的呼声甚嚣尘上。但如果真入了关，情况会如何呢？会不会也出现墨西哥一类的情形呢？很有可能。看看目前国人的种种崇洋媚外的购物心态，复关以后，中国的国际收支能保持得住平衡吗？

房地产热，当然需求是有的，否则北京的写字楼租金也不会在世界排行老四。于是北京、上海便大上写字楼。盖了多少大厦啊！光上海浦东就上百幢。但中国的房地产行情是直接同外国资金联系在一起的。假如外国投资者不来光顾，你盖了那么多楼闲在那里又有何用呢？要知道外国资金是能进来也能出去的。你国内的经济稍有闪失，它马上就会逃走。那你白花了一顿钱，不是造成资源浪费吗？外国资

金能把你吹乎起来，也能把你摔一跟头。

看看广西的北海市，一座座半截子楼停在那里，盖了一半就没钱了。也有不少已经建好了的，富丽堂皇的，但耸在那里只是摆样子。在杭州的西湖之畔，一幢五星级的高级宾馆冷冷清清，门前冷落鞍马稀。像这种情形在全国有多少啊！

然而，就在北京故宫的周围，一大片平民房中，人均两三平米的住户还大有人在。至于说全国还有8000多万贫困户，其窘境就更不用说了。

数字是最说明问题的。1994年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643亿元，中部地区为1640亿元，而西部仅有988亿元，以省份来比更显出差距来。1994年广东一个省投资就将近1000亿元，上海为650亿，辽宁为550亿，山东为480亿，北京为400亿，而甘肃仅有70亿，贵州不到50亿，青海和宁夏不足30亿，陕西、山西和内蒙也仅仅是100亿左右。

再看农业与工业的投资额之比，1994年1—11月份，国有单位的投资比较为：农业109亿元，工业3510亿元。农业投资仅占工业投资的1/35。

如此地偏重东部和工业，如此地冷落西部和农业，其造成的结构差异将来必然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带来隐患。其实一些后果现在已经出现了。

中国龙的说法已经唬住了不少外国人，但也有头脑比较冷静的学者指出了中国式发展的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不无道理。他说，亚洲新兴工业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与5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相同，其主要原因几乎都可以用“资源总动员”来解释。那就是说，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并非是生产率方面的改善，而是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而这种投入是有止境的，到一定时候便会出现利益递减的局面。

看看我国这些年土地、矿产、水、空气、人力、物力资源的使用状况，看看我国环境付出的代价，如果用当今新兴的资源经济学来核算，我们的某些发展实在是得不偿失。

尤其是近几年间，越来越多的人被一种富裕的假象所迷惑，一股虚骄之气到处蔓延。人们学会了吃喝玩乐，追求新潮和名牌，就是没想到如何钻研点技术，多长些知识。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艰苦奋斗和勤俭朴素的精神一刻也不能丢。然而，在某些企业或政府那里，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如何寻求资金，如何铺摊子上项目，而不是钻研技术，讲求经济效益。结果怎么样呢？有些项目是上去了，但效益却下来了。试问：中国的经济增长靠技术因素增长的部分能占多大比例呢？恐怕连20%都没有。

智力投资，一个严重倾斜的天

平，今天已应引起人们高度重视了。一个国家的真正的财富在国民的头脑中。然而遗憾的是，目前人们更多注意的是有形财富，而不是无形财富；目光更多盯着的是外国人的钱袋，而不是自己的脑袋。现在是有必要大喝一声“莫入误区”的时候了！

归根结底是效益问题！如果光顾速度和数量，不管效果和效益，那么高发展就是高浪费，高速度就是高犯罪。外国投资者不是傻瓜，你国内的经济搞得不好，他才肯来，你搞得不好，人家远远躲着你。最近某些外商已经在对中国的债务支付信誉问题进行议论了。一位日本的高级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目前中国吃香的情况可能是搞错了，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必然引发严厉的经济紧缩，因此今后两年可能不是在华投资的最佳时间。

所以，对我们头脑中的盲点常泼点凉水是有好处的。还是要脚踏实地，对国内和国际情势保持清醒的头脑。

（摘自《良友》1995.5.）

天下奇景·洞中洞 美国肯塔基州的猛犸洞，由大小250个溶洞组成，并分为5层。洞的上下左右互相串通，洞中有洞，洞外有洞，宛如巨大曲折、幽深莫测的地下迷宫。此洞内共有77个地下大厅、8条暗河、7道瀑布，洞径长达250千米。

亚洲的崛起与欧洲人的心态

关 愚 谦

亚太经合论坛非正式峰会在印尼召开，可是在欧洲，尤其德国的媒介，却报道得少之又少。为了报道这届亚太经合会议，全世界共有4000记者去了雅加达，可是从欧洲去的只有一打左右。大概他们认为，亚太会议与我何干？

“在欧洲没有人去理会他们”？

德国最严肃、层次最高的报纸《时代周刊》终于禁不住了，它于去年11月25日发表一篇《巨象站起来了》的文章，大声疾呼，要欧洲人不要再麻痹下去。该文章的第一段话是：

“一张照片，传遍了半边天，照片上，18个来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的首脑，穿着印尼马来式的花色衬衫，在高兴地向世界摆手微笑，其中有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中国主席江泽民、美国总统克林顿，他们好像也在向欧洲摆手！但是，在欧洲没有人去理会他们……”

“这18个首脑在11月15日做出决议，最迟在2020年在亚太区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日本、中国、台湾、香港，六个东盟

国家新、马、泰、菲、文莱、印尼，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美、加、墨西哥、智利，简称APEC，这么一个重要的、大有发展前途的、决定世界方向的新兴组织，偏偏在欧洲，没有反应……”

“1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到一起，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有着世界一半以上的生产总值，坐在一起研究合作，可是欧洲联盟不屑一顾，竟连个观察员也不派去，唯一与这一组织有联系的是德国奔驰汽车公司……”

欧洲商人“还在温床上做大梦”

“欧洲离开印尼是那么遥远，打开《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新闻版，很少见到一条有关欧洲的消息（显然夸大其词），在印尼近千万人口的首都雅加达，在有八条车道的高级路面上日夜不停地行驶着大小汽车，几乎看不到欧洲生产的汽车。马路上的广告牌，高楼大厦顶上的霓虹灯，报纸杂志的插页，见不到欧洲厂商的名字。”

这篇文章用了夸大和刺激性的

语言，是完全站在欧洲人的角度上为欧洲着急，他恨这些漫不经心的商人动作太慢、太迟钝，看不到亚洲的兴隆，还在欧洲的温床上做大梦。

这篇由布赫史坦纳写的文章，接着酸溜溜地写道：“亚洲在展翅飞翔，日本和美国也跟着高飞。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斯坦就APEC运动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表示，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把注意力放在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在冷战结束以后，重心在转移，它今后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这一时代的转变，欧洲人是否已看到……”

布赫史坦纳继续写道：“就在美国和欧洲——泛大西洋经济圈——进行合作时，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易在不为人注意地进行，而且逐渐增多，人们并未发现到这一情况；即在东亚的中产阶级，人数已达3亿，几乎相当于欧洲的中产阶级总人数。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到本世纪末，东亚的中产阶级会增到10亿人。”

这位评论家用更深一层的含义向读者提问：“这样的发展，只是如经济学家伯格斯坦所说，有着历史上从未有的贸易前景？这是世界政治的转移。”

欧洲中心主义深入骨髓

我对他“世界政治的转移”这句话不太理解，因而在最近与一些人聚餐时，特向一位喜欢政治的德

国朋友请教。他开玩笑地说：“这是指世界进入21世纪时，亚洲将发号施令，把欧洲称为经济发展中国家，给欧洲援助，对付伊拉克似的战争将由中国或日本去发动。”另一位说得更露骨：“将来，我们的西方姑娘都嫁给东方人，300年以后，全世界都将用筷子吃饭。”

虽然，最近德国的态度在变。去年11月28日晚上，汉堡负责经济的副州长请驻汉堡的所有中国公司老总们吃饭（我也被请当陪客），这是我在汉堡20多年来第一次见到的罕事。副州长非常热情，愿“无私”帮助中国，但是字里行间仍改不了他那“老子技术天下第一”的傲气。

德国《时代周刊》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它的特点是没有新闻，几十版全部是大块评论文章。由于该报的评论员论点深入、观察入微、分析到家，以致它的报纸持久不衰。并且是波恩政治家办公桌上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

欧洲人的欧洲中心主义已经深入骨髓。他们始终认为，欧洲应永远是世界的中心，欧洲人永远应比其他地区的人先进。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产品是全世界最好的，因而造价贵也是很正常合理的。

夜郎自大正合美日心意

其实，这种观点正在被人们逐渐修改中，一个西方工业杂志在几月前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德国人的自以为是。该文章说，德国人

自己骗自己，夜郎自大，实际上，德国目前生产出的产品，其质量不一定都胜过其它国家，有的质量正在下降中。好的产品，能超过其它国家的，最多只占10%而已。有意思的是，目前有些德国工厂也在进口中国生产的机器。我曾问他们为什么，该企业主说，中国的机器质量虽没有德国好，也不漂亮，但造价便宜得多，只要我们略加改装就能够用，那我们何必去花那么多钱呢！

欧洲不关心亚太经合会议，实际上正合美国和日本之意。日本早就打人东亚、东南亚市场，现在美国也亦步亦趋地走了进来，日本人已经不太满意，只是不敢说而已。欧洲人的思想和生活与东方人脱节太多，因而，即使德国总理三访中国和亚洲，德国的实业家，除了实力极强的那些如西门子、奔驰、大众等大企业以外，一般的中等企业（占全国生产总值75%）都不敢冒险，就像站在游泳池旁不敢先下水的人一样，这也正合已经下水的美国和日本人的心意，你越下来得慢，我越高兴，最后还要嚷上几句：“这里的水好冷啊！”

欧洲人，尤其是西欧人，与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美国人一般比较随便，拿起汉堡包来就啃，用刀用叉也很随便，这和生活上较随便的亚洲人易于打成一片，可是死板、保守、有板有眼的西欧人，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有吃相，

看见一些不合他们习惯的人就指手画脚，因而西方人要想放下架子同亚洲人做生意，那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所以《时代周刊》的评论家才会那么着急。

不平衡的欧洲人心态

欧洲人包括欧洲媒体之不愿大力报道亚太经合论坛在印尼会议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与他们不平衡的欧洲人心态有关。欧洲人统治世界几百年了，哪能看到一个有色人种地区兴起。日本人这几十年的起飞，抢去了德国的许多生意，照相机、汽车等等，已经把德国人气得咬牙咬得咯咯地响，现在，不但甯出一条一条小龙，还引出来一条大龙，这还了得，这不是造反了，世界还成体统吗？于是，现在在欧洲，“黄祸”一词又甚嚣尘上。

他们之中，有的是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子里，有的是，我和你作生意，当然，我得大赚，你小赚，这是我们几百年的老规矩了，你不接受，算了。真没想到，几十年一晃，你们的毛羽丰满，翅膀比我的都硬，跟我讨价还价起来。但是，我相信这种不平衡心态只是一个过渡，欧洲年轻人会好些。我估计，不要再隔多少时候，亚洲，尤其是中国会遇到一个欧洲投资浪潮，即在岸上怕水冷的人都会纷纷跳下水来。

（摘自《海外星云》

1995.6.）